

汤因比与厄本对话录

汤因比论 汤因比

Tangyinbi Lun Tangyinbi
Tangyinbi Yu Eben Duihua

三联文库

世界经典随笔系列



上海三联书店

三联文库·世界经典随笔系列编委会
(按姓氏笔划排列)

马小军 冯芝祥 许纪霖 李頔申
陈达凯 陈保平 姚 鹏 黄筑荣



Sarban Amdin
Su'ie Tingchen Sarba Aini



汤因比论汤因比——汤因比与厄本对话录

译者/ 王少如 沈晓红

特约编审/ 施正康

责任编辑/ 蒋安立

装帧设计/ 范昕青

责任制作/ 沈 鹰

责任校对/ 贺 炜

出 版/ 上海三联书店
(200020) 中国上海市绍兴路7号

发 行/ 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
上海三联书店

制 版/ 上海申亚出版发展公司

印 刷/ 上海市天华印刷厂

装 订/ 上海市天华印刷厂

版 次/ 1997年12月第2版

印 次/ 1997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98千字

印 张/ 5.5

印 数/ 1-10 000

ISBN7-5426-1110-0

K·71 定价:8.80元

三联文库·世界经典随笔系列

S.S.
K.O.
14

汤因比与厄本对话录

汤因比论

汤因比

王少如·沈晓红·译

Tangyinbi Lun Tangyinbi
Tangyinbi Yu Ehen Duihua



3 0005 4963 8

上海三联书店



译者的话

1972—1973年间,英国“自由欧洲”电台播出了一组脍炙人口的广播对话节目。对话者以生动的言辞、轻松的语调、敏感的话题、独到的见地,谈古说今,纵论时势,海阔天空,神采飞扬。对话的双方,一位是电台播音员G·R·厄本,另一位便是被誉为“国际性智者”的著名历史学家A·J·汤因比。

(一)

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年4月14日出生在英国伦敦一个有文化教养的中产阶级家庭里。父亲哈利·汤因比先后在茶叶进出口公司和一家慈善机构任职,母亲萨拉·马歇尔是美国第一代女大学生,也是一位历史学家。他的叔伯老阿诺德·汤因比是19世纪下半叶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社会改良主义者,另一位佩·汤因比则是著名的语言学家和文学家。这样的家庭背景,使他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尤其在母亲的影响下喜爱历史,并多少带有一点自由主义的色彩。

在汤因比的童年时代,人们对古典教育颇为重视。他

7岁开始学拉丁语,8岁学希腊语,后来又在牛津大学巴里奥学院攻读希腊、拉丁古典作品。他自称:“希腊、罗马的语言、艺术、历史乃至时代精神气质对我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后希腊时代西欧的文化对我的影响。”^①古典教育赋予他宽广的视野,使他日后得以从宏观上对人类文明史进行探索和研究。在他看来,对于一个想成为历史学家的人而言,这种古典教育简直是“无价之宝”。

1905年,汤因比在阿·齐默恩的指导下,潜心研究希腊、罗马历史。齐默恩曾被认为在古希腊史和现代史之间的深渊上“建造了许多桥梁”,这对于汤因比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11年,汤因比在雅典的不列颠学院进修期间,曾徒步漫游希腊各地。他考察过古希腊将军义巴敏诺达和菲罗波门的遗迹,并仔细探讨了这些文化废墟与现时代的关系。1912年,他回到牛津大学巴里奥学院,担任古代史教师,开始了他那漫长的学术生涯。从青年时代起,汤因比便被认为是希腊、罗马史和近东问题的专家。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汤因比正在给大学生们讲授古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的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战争使他的理解力突然得到了启发,他领悟到:“我们在当时的世界上所感受的经验,修昔底德在他所处的世界中早已经历过了。”^②这使他深感,有必要在历史研究中运

① A·J·汤因比:《历史研究》,第10卷,牛津大学出版社,1954年版,第92页。

② A·J·汤因比:《我的历史观》,载《经受考验的文明》,牛津大学出版社,1948年版,第7页。

用比较的方法。而此后,这种历史比较法便自始至终贯穿于汤因比的史学著述之中。

战争期间,汤因比到英国外交部政治情报司任职。1918年,他曾作为英国政府代表团中的近东问题顾问,参加过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巴黎和会。战后1919年,他被任命为伦敦大学教授,在科雷斯讲座中主讲拜占庭史和近代希腊史。这时的汤因比,已经是一位颇有声望的知名学者了。

1920年,汤因比就萌生了撰写一部宏观性的多卷本《历史研究》的念头。1921—1922年希土战争期间,他以《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的身份,到希腊、巴尔干半岛、土耳其一带进行采访。在这次近东之行的列车上,他浮想联翩,突然神思飞来,便拟定了一个编写提纲。以后在实际写作时,这份大纲几乎很少有过变更。

从1920年起,汤因比受命主编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的年刊《国际事务概览》。1925年,他出任这个学会的研究部主任,并被聘为伦敦大学的国际关系史研究教授,他担负这两个职务长达30年之久。1937年,他又被任命为英国皇家科学院研究员。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汤因比被英国政府倚为“智囊”,曾以顾问身份参加过许多重要的国际会议。1943—1946年,他还担任了英国外交部研究司司长。战争结束后,他又作为英国政府代表团的成员,出席1946年的巴黎和会。

1947年,汤因比前往美国讲学。后来,他又应美国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的邀请,在那里完成了《历史研究》最后数卷的写作。1955年,牛津大学和伯明翰大学授予他荣誉

文学博士学位。同年,他以功勋教授名衔退休。

在战后的年代里,汤因比还作为一个和平主义者活跃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他反对美国的侵越战争,谴责以色列的中东政策,抨击南非的种族歧视,直到晚年仍孜孜不倦地宣传世界和平,关心人类命运。

1975年10月22日,汤因比因病逝世,终年86岁。许多国家的报刊都对此广为报道,并发表专文,悼念这位蜚声国际的史学巨匠和哲人。

汤因比一生著作甚丰。他除了经常为《国际关系》、《民族》、《亚细亚》、《现代评论》等杂志撰稿外,还写过几十部著作,其中主要有:《民族和战争》(1915年版)、《新欧洲》(1915年版)、《巴黎和会以后的世界》(1925年版)、《中国之行漫记》(1931年版)^①、《经受考验的文明》(1948年版)、《文明与战争》(1951年版)、《世界与西方文明》(1953年版)、《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1954年版)、《基督教在世界各大宗教中的地位》(1958年版)、《从东方到西方:一部周游世界的旅行记》(1958年版)、《希腊文明时期:一个文明的历史》(1959年版)、《美国与世界革命》(1962年版)、《汉尼拔的遗痕:布匿战争对罗马社会生活所产生的影响》(1965年版)、《习俗与变革:我们这个时代的挑战》(1966年版)、《我所认识的一些当代人物》(1967年版)、《我的经历》(1969年版)、《希腊史上的一些问题》(1969年版)、《变动中的城市》(1970

^① 1929—1930年间,汤因比应邀前往日本参加太平洋关系学会召开的一次会议,途中曾到过中国的上海、南京、天津、北京等地。该书记载了他在中国的见闻。

年版)、《拯救人类的未来》(1971年版)、《居世界之半》(1973年版)^①、《人类与大地母亲》(1976年版);他还编过两本文集:《古希腊的史学思想》(1924年版)、《希腊人的文明和风格》(1925年版);并与人合著《1920—1923年国际关系概述》、《土耳其》(1926年版)等等。而使汤因比声誉鹊起、彪炳史册的,则是他那煌煌12大卷、洋洋500多万字的巨著《历史研究》。

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从1921年大纲拟出、1934年前三卷问世,到1961年最后一卷付梓、1972年由他手订的节录本出版,前后历经数十年,可以说,倾注了他一生的心血。在这部巨著中,汤因比通过对近6000年来人类历史的比较研究,揭示了各种文明形态及其起源、生长、衰落、解体的一般规律,从而创立了他自己的历史哲学体系——文明形态史观(亦称历史形态学)。

(二)

汤因比的历史哲学理论,体系庞大,内容丰富,标新立异,独树一帜。其主要论点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

一、历史研究的基本单位是“文明”。

汤因比所谓的“文明”,是指具有一定的时间与空间联系的某一人类,这个整体一般包括若干同样类型的国家;文明形态具有三个侧面:政治、经济、文化,其中文化是文明的精髓,而政治、经济则是次要的成分;文明形态最深厚的基础是宗教,各大文明实际上就是按照宗教的性质来划分

^① 这是一部关于中国和日本的文化史著作。

的。在他看来,历史研究中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最小的单位不是一个个民族国家,而是一个个文明形态。

根据这一论点,汤因比认为,在近6000年的人类历史上出现过26个文明形态^①,它们是:西方基督教文明、东正教文明(它可分为拜占庭文明和俄罗斯文明)、伊朗文明、阿拉伯文明(它与伊朗文明可合为伊斯兰教文明)、印度文明、远东文明(它可分为中国文明和朝鲜—日本文明)、古代希腊文明、古代叙利亚文明、古代印度文明、古代中国文明、米诺斯文明、苏美尔文明、赫梯文明、巴比伦文明、古代埃及文明、安第斯文明、古代墨西哥文明、育加丹文明、玛雅文明,以及5个停滞的文明:玻里尼西亚文明、爱斯基摩文明、游牧文明、斯巴达文明、奥斯曼文明。

汤因比还指出,上述大多数文明形态都是某一个或某几个文明形态的“母体”或“子体”,它们之间具有历史的继承性;而这种继承性并不像一个人的生命过程,倒恰似几代人的生命延续。例如,古代希腊文明的母体是爱琴文明,而子体则是西方基督教文明和拜占庭文明。他把这种关系比喻为文明形态的“亲属关系”。

二、一切文明在哲学上都是同时代的和同等价值的。

汤因比认为,就时间长度而言,历史最长的文明形态只不过三代,刚超过6000年;而整个人类的历史少说也有30多万年。两者相比,文明形态的历史只及人类历史的2%,

^① 汤因比对文明形态的划分并不一致,有时说是21个(加上5个停滞的文明为26个),有时则认为23个(加上5个停滞的文明为28个),后来又扩大到37个。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文明都可以说是同时代的。再就价值尺度而言,与原始社会的状况相比,各个文明形态所取得的成就都是巨大非凡的;而与人类理想的标准相比,这些成就又都是微不足道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所有文明的价值都可以说是相等的,谁也没有资格瞧不起谁。

由此,汤因比得出结论:一切文明形态都是可比的——历史学家不仅应当将古代希腊、罗马的历史与现代西方的历史进行纵向比较,而且还应当把一切文明的全部历史进行横向比较,这样才能从整体上把握人类历史发展的趋势。

三、每个文明都要经历起源、生长、衰落、解体四个阶段。

在汤因比看来,人类历史的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他把生物学的规律运用到文明研究之中,提出了文明兴衰的四阶段论,认为文明形态就像一个有机体,每一个文明都要经历起源、生长、衰落、解体这样四个阶段,并以此作为他描绘整个人类历史的模式。

汤因比曾把文明形态的这一周期性发展比作织布机梭子或车轮,它每往来穿梭或转动一次,并不是回到原地,而是织出了新图案或向前进了一步;也就是说,每经历起源、生长、衰落、解体这样四个阶段,后一代文明就比前一代文明有所进步。人类历史正是在这种周而复始的循环中向前发展的。

四、文明兴衰的动因是“挑战——应战”机制。

汤因比认为,历史发展的全部过程表现为摆在某个文明面前的一系列重大任务,以及人类对这些任务的一系列解决方式。他把摆在当前的重大任务称为“挑战”,把解决

任务的正确方式称为“应战”，并用“挑战——应战”理论来解释文明形态的起源、生长、衰落和解体。

在汤因比看来，人类之所以能够创造文明，就是由于人类面对某种困难的挑战进行了成功的应战；具体地说，文明的起源乃是两种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一方面，文明起源的环境异常艰难，足以引起刺激，构成挑战；另一方面，社会上的少数人富有创造力，能够成功地进行应战，而缺乏创造力的多数人则进行模仿。他曾把挑战概括为五大类：(1)困难环境的刺激，(2)新的生活环境的刺激，(3)打击的刺激，(4)压力的刺激，(5)遭遇不幸的刺激；并进而指出，母体文明主要起源于自然环境的挑战，子体文明则主要起源于人为环境的挑战，它一般发生在母体文明的衰落时期。汤因比还特别强调，挑战和应战是有规则的，并非挑战愈强、刺激愈大，而唯有强度适中的挑战才能引起富于成效的应战。

从文明的起源转入文明的生长阶段，只有一次挑战和应战是不够的。汤因比认为，文明的生长需要一种“生命冲动”，以便使挑战的对象再度面临一次新的挑战，从而刺激它进行新的应战，随后又使它面临新的挑战，又引起新的应战……如此循环，以至无穷；也就是说，只有使文明处于挑战——应战——新挑战——新应战……这样一个周而复始的运动过程之中，它才能生长。他还指出，衡量文明生长的标志是其内在的、精神的自决能力，即在一系列挑战和应战从文明外部移入文明内部、从物质水平转到精神水平这一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某种文明的生存能力。

当那些富有创造力的少数人丧失了创造力，不能再对困难的挑战进行成功的应战的时候，多数人便相应地取消

了模仿行为,于是,社会就失去了统一性,文明逐渐走向衰落和解体。汤因比强调,文明衰亡的原因不是外在的、物质的,而恰恰是由于它丧失了内在的、精神的自决能力,亦即丧失了“挑战——应战”机制。

五、文明解体的类型分为希腊——罗马模式、中国模式和犹太模式。

汤因比认为,文明解体阶段最突出的特征是社会体一分为三:少数创造者蜕变成少数统治者,多数模仿者则转化为内部无产者和外部无产者。于是,在这个阶段就出现了三种现象:经过一段混乱时期以后,少数统治者依靠暴力建立了统一国家;内部无产者便创立统一教会与之对抗,而在母体文明解体到子体文明产生之前的所谓间歇时期,正是这种统一教会才使文明的种子得以保存并流传下去;外部无产者则组成军事集团,通过民族大迁徙侵入文明社会,与内部无产者一起摧毁了统一国家。随着母体文明的灭亡,从中又产生了新的子体文明。汤因比把文明解体的这一类型称为希腊——罗马模式。

在汤因比看来,古代希腊文明从布匿战争以后逐渐走向衰落和解体。经过 100 多年的混乱时期,凯撒、屋大维削平群雄,建立了统一国家——罗马帝国。但罗马的统一只不过暂时延缓了文明解体的进程。由于少数统治者依靠暴力维持其统治,导致帝国内部的人民离心离德,对境外毗邻的蛮族也失去吸引力。于是,前者成为内部无产者,后者则成为外部无产者,罗马帝国陷于内外交困之中。到马可·奥勒留时代,罗马进入了所谓间歇时期。在这期间,内部无产者创立了基督教。随着基督教的广泛传播,整个罗马社会

和外来的蛮族都皈依了基督教,这时,统一教会便应运而生。而另一方面,外部无产者组成了军事集团。以日耳曼人为主体的蛮族开始民族大迁徙,侵入罗马境内,并与内部无产者的起义相结合,摧毁了西罗马帝国。古代希腊文明灭亡了,从中又产生了新的文明——西方基督教文明和拜占庭东正教文明。

汤因比起初曾把这一希腊——罗马模式当作普遍规律,用来分析人类历史上各大文明形态的解体。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发现,仅仅用希腊——罗马模式还不足以概括文明解体的诸多途径。于是,他又增加了一个中国模式和一个犹太模式,以弥补其理论的欠缺。

在汤因比看来,古代中国文明在西周以后就开始出现衰落和解体,经过春秋、战国时代这一混乱时期,由秦始皇建立了统一国家;但是,在秦统一以后,并没有出现所谓间歇时期,而是呈现一治一乱、一分一合的局面。汤因比便把这种治乱交替的历史形态称为中国模式。他认为,希腊——罗马模式普遍符合各大文明早期的历史,而中国模式则普遍符合各大文明后期的历史,尤其是埃及、拜占庭、印度等地区的历史。他甚至设想,如果将这两大模式加以综合改造,就可以构成一个新的希腊——中国复合模式,它兼取两者之长,将比单一的模式更能概括各大文明形态的解体过程。

此外,汤因比又发现,历史上还有一些民族,特别是犹太人,虽然其国家已经沦亡,人民不得不浪迹天涯,但他们以传统的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为精神纽带,以新兴的经济力量为物质基础,在寄人篱下的逆境中仍能保持其民族的

认同,表现出惊人的创造力。汤因比便把这种散居社群的历史形态称为犹太模式。

汤因比认为,要对各大文明形态的历史进行多线式的比较研究,非借助模式不可。他提出上述三大模式,不仅力图概括各个文明在解体阶段所呈现的不同类型,而且还试图对人类的未来有所启迪。在他看来,人们可以通过希腊——罗马模式来了解从区域性小邦到大一统帝国的情况,从而领悟到凭借武力称霸世界只能导致人类的毁灭;人们还可以通过中国模式来了解统一国家在治乱交替中得以延续的情况,从而认识到中国在世界和平统一的事业中将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人们又可以通过犹太模式来了解在大一统的世界上保持民族文化特性的情况,从而预见到地域性的民族国家终将消亡,而散居社群可能将成为未来世界的社会形态。汤因比虽然认为,在现存的文明形态中,唯有西方基督教文明没有出现衰落和解体,但面对社会现实,他对西方文明的前景忧心忡忡,而逐渐把希望寄托在东方。

综上所述,汤因比的文明形态史观是一种宏观历史学的理论。它摒弃了西方传统史学中的国别史和断代史的概念,通过对人类历史上各大文明形态的纵向和横向的比较,力求从整体上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它反对历史循环论和宿命论,强调历史进步论和人的自决能力,并用挑战——应战机制来解释文明形态的兴衰更替;它破除欧洲中心论和单线发展论,展示了世界历史演变的不同模式和多样性,并藉以教育当代,垂训未来。汤因比的历史哲学体系虽然在本质上带有某些唯心主义的因素和宗教的神秘色彩,但它作为 20 世纪西方史学史上的一个著名流派,对于我们开拓

学术视野显然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三)

《汤因比论汤因比》一书，是在汤因比与厄本的广播对话记录稿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它出版于1974年，即汤因比逝世的前一年。因此，这本小册子可以说是汤因比对他毕生所从事的历史研究的一个小结，足见其文化价值和学术意义非同一般。

本书所论及的内容非常广泛。总的看来，全书在结构上分为两大部分：上篇题为《方法》；下篇题为《模式》。上篇主要探讨汤因比对历史本质的认识及其研究历史的方法；下篇则着重论证汤因比从人类历史中概括出来的若干规律和模式。围绕着这样两个主题，全书以对话的形式展开了精彩而深刻的陈述。

“历史是一门科学还是一门艺术，抑或两者都有一点呢？”这是本书开门见山就提出的一个历史哲学问题，也是贯穿于上篇的一根主线。在汤因比看来，历史只不过是胜利者的宣传，它必然带有某种主观性和相对性；任何历史学家都不可能摆脱他所处的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排除道义和偏见的影响，去撰写纯客观的历史；即使采用电子计算机也不能例外，因为替它设计程序和对计算结果作出解释的依然是人。汤因比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耐人寻味的，他认为，历史介于科学和艺术之间，因而历史学家必须兼备科学家的求实精神和诗人的激情。

在上篇中，汤因比通过对一系列历史现象的分析，进一步阐发了他的整体研究方法，并强调历史是有规律性的。